

CHINA

in the Next
30 Years

【美】迈克尔·赫德森
【英】凯瑞·布朗
王缉思、韦森
等著

中国未来30年

III

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05401

F123.2-53
07
V3
CHINA IN THE NEXT 30 YEARS

【美】迈克尔·赫德森

【英】凯瑞·布朗

王缉思 韦森

等著

中国未来30年

III

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



F123.2-53

07

V3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未来三十年Ⅲ——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 / (美)赫德森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 - 7 - 5117 - 1827 - 3

I. ①中…

II. ①赫…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②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 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556 号

中国未来三十年Ⅲ——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小燕 霍星辰 杜永明 王琳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 211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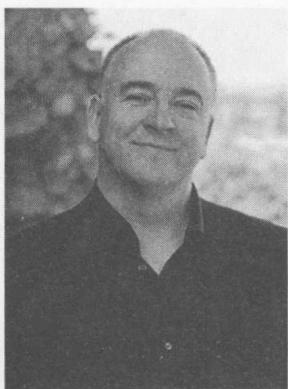
2030 年的中国	[英] 凯瑞·布朗 / 2
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强国探寻未来之路	王缉思 / 10
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朱云汉 / 22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	[瑞典] 克拉斯·埃克隆德 / 50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韦森 / 66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 / 80
房价，中国政府该如何控制	[美] 迈克尔·赫德森 / 96
中国经济的崛起如何改变全球商品市场	[美] 大卫·黑尔 / 116
美中投资关系及问题	[美] 韦恩·M. 莫里森 / 146
中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关系变迁	[美] 加里·海瑞格尔 / 160
中国反腐路在何方	何增科 / 192
中国未来 30 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继续深化经济改革	王松霈 / 204
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美]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 212



中国未来 30 年Ⅲ

2030 年的中国

[英] 凯瑞·布朗



凯瑞·布朗 (Kerry Brown)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曾在《卫报》、《每日电讯报》等报刊以及 BBC、ABC 等媒体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布朗博士为许多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提供过中国问题的咨询。他曾为之服务过的组织和公司包括：大赦国际、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法国里昂证券、牛津分析战略咨询公司、英国战略情报公司等。他的著作包括：《抗争中的巨人——处于 21 世纪的中国》(2006 年)、《崛起的龙——中国在改革期间的投资流向》(2008 年)、《朋友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2009 年)、《投票箱的中国》(2011 年) 等。

接下来的 20 年，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这比中国共产党预期的要早，也出乎很多外界人士的意料。

- 未来的 20 年，中国将面临人口、经济、环境和政治等方面的挑战。中国政府在这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若处理不当，都会产生不稳定因素，进而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

- 中国的发展内在固有的不稳定性不可小觑。尽管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但其片面追求 GDP 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要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任务日益艰巨。

-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十分关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控制着关键领域方针政策的决策权。但是，在未来 10 年里，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积极策略，进行更深入的法制改革，确保公民社会各团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处理这些关键问题的能力，将决定接下来的 20 年，乃至 2030 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性质，以及中国整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经过不断探索，在 21 世纪进一步稳固其执



政地位。2001 年，中国共产党重新接受商界人士入党，为其政权扫除了最后一个大威胁。中国共产党目前有 8000 万党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党，成为 21 世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还领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社会力量。

然而，中国共产党目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果在某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将从根本上威胁其政权。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需要采用新思想、新途径来应付中国所面临的各大挑战，以确保其政权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于环境、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的国际角色问题，中国国内存在多种公众舆论，这些舆论不断地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决策。以微博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就说明了这个现象。中国目前有 3 亿微博用户。可想而知，当代中国社会言论错综复杂，要想达成共识实属不易。与毛泽东时代不同，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再享有无可争议、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必须谨慎选择管理范围。自 2001 年以来，温家宝总理等中国的精英领导人都曾谈到他们很担心社会动荡和群众抗议的发生。尽管如此，在处理各省以及国家层面的各团体之间的冲突方面，在处理各团体对精英利益、资源和权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方面，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和结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介绍，2009 年中国共发生群体事件 10 万起。另一项统计显示，2009 年向中央政府的请愿达到 900 万次，请愿的原因涉及土地权、退伍军官的抚恤金问题以及国企下岗职工的养老金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在日益发展富庶的同时，也面临着其他国家曾遇到过的各种社会争端和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表示，他们希望在 2050 年前实现中国特有的民主。至于这种民主的具体形态，他们没有详细说明。但他们明确表示，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欧洲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所适用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在 2007 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在其发言时 60 多次提到了“民主”这个词。中国领导人现在谈起民主时，要比以前更为自信了。他们甚至还在 2005 年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但是，在这些文件和演讲词中，

民主这个词的含义被极度缩小了。显然，中国共产党对于西方的多党执政模式并不感兴趣。相反，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在其内部实现真正的竞争，杜绝国外具代表性的民主形态扰乱中国的稳定。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回忆起 1949 年中共执政前所遭受的社会动荡与国家贫弱，而后将自己与稳定关联起来，称自己是国家社会稳定真正的捍卫者。

但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求愈加严格。中国共产党在扩大决策参与、健全法制、实现社会公正、提高执政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对于其继续执政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 2007 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未来 20 年，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两个领域进行根本性变革，改变目前的行为模式，改变当前单一的“共同选择”策略，采取更积极的策略，以达到水平更高、要求更严的大众的期望。这两个领域即实现真正的法治，包容民间社会团体。目前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领域的控制和介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再逃避一个事实，那就是总有一天，中国的法院会开始叫板并最终反对政府决策。和其他过渡期的社会一样，中国也正在走向那一天，那时，法院将有权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守其政府所通过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选择反对，也可以选择接受并顺应全新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将被重新定义。在过去的五年里，不少中共党员坚决遏制律师质疑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权力。他们表示决不会允许律师这样做。一些社会团体被看做是“病毒”，携带各种叫板中国共产党主导地位的行为，来侵害中国政治。这也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过去 20 年，中国出现了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一些城市，这些社会团体与政府挂钩，为政府办公。然而，中国共产党仍然对一些社会团体持怀疑态度，置之于法律边缘，不赋予其明确的社会地位。去年，一些社会团体就汶川地震问题发起抗议，其负责人即被逮捕关押。这说明，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在关键领域跟中国共产党叫板的人，中国共产党意图并准备采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压制。

接下来的 20 年，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这比中国



共产党预期的要早，也出乎很多外界人士的意料。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积极策略，应对那些可以对其审判进行质疑的真正独立的法庭，还需要给社会团体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采取策略，对付那些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目前这种将所有群体纳入共产党的策略是不能持久的，终将产生某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考虑继续这样压制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出现公众集体反对，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社会动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在未来 20 年的命运。如果中国共产党恪守不变，那很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甚至剧变。如果它制定一项务实的公约，积极参与落实，那么前景还是乐观的，尽管其统治地位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会有所改变。

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是因为在未来 20 年它将面临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准备采用 20 世纪中期苏联所采用的高度集权制，来应对这些问题。在诸如经济发展、气候变化、法制改革等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精英领导人甚至都不能达成共识。这着实令人担忧。社会上，大量的网站、博客和杂志中都能看到中国民众的各种观点。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只采用华丽的辞藻，来显示大众对政府关键决策的支持。另外，还需要采取措施让公众参与管理，以化解民众对腐败、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极度不满。

其实，在 2020 年前会发生的一些问题，现在就可以预知一二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断加重。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达到 106: 100，在农村甚至达到了 140: 100。这样下去，到 2020 年，中国将有 2000 万至 3000 万单身男性。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平均每两个工作者就要赡养一个退休老人。家庭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传统的赡养老人和其他受抚养者的网络已经逐渐瓦解。接下来的十年，中国必须采取新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到 2025 年，中国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将居世界之首，其消耗量甚至可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消耗量的总和。尽管中国将建立庞大的核电站（2020 年前将达到 30 个），并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其发展仍会依赖矿物燃料，尤其是煤炭。这必然会导致环境问题。中国急需能源，定会和中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开展能源大战。同时，对能源的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由依靠制造业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一种价值更高、耗能更少、以国内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模式。另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汽车数量不断攀升，城市化日益加快，都将对自然环境造成压力，导致生态失衡。这就要求中国在 2030 年前开发新技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在 2030 年前，中国还需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即水供应和清洁水资源的问题。据估计，中国目前 70% 的淡水都已被污染，东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期干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淡水供应也极度紧张。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都受到狭窄的、单一的政治熏陶。他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为党服务，对党忠诚。但是他们在处理一些关键的战略性问题时，不得不施展自己与民众沟通的能力，如同西方的政治家们那样，向民众提出一些政策，然后说服民众支持政府。甚至当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一些艰难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侵犯一部分民众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都很谨慎，信仰渐进主义，但同时他们也很清楚，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遭受的长期社会动荡是多么可怕。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更团结了。

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在 2030 年将不复存在。到那时，中国将会出现另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共产党可能（但不是一定）仍处于主导地位，但会把一些重要领域让给民间团体或其他政治派别来参与管理。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成功作出这些让步，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仍是国际社会一个强盛、统一的成员。但如果它在上述这些关键问题，尤其是政治改革上处理不当，那就可能会导致失败、政权瓦解、社会剧变等可怕



的结果。中国与全球经济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这些后果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对全球稳定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并不是因为它会意图对外扩张，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很脆弱，随时可能破裂。

(张学敏 译)

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 强国探寻未来之路^①

王缉思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等。曾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任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① 本文原载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年2月28日至3月2日。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外事务，显然它们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发出同一种声音。这种情况常常使国外人士和中国公众陷入疑惑。

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必须至少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该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些外部力量对其构成威胁？为保障本国安全，该国领导人应当做些什么？当前，对于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大战略仍无定论。一方面，在过去的大约 30 年中，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显现了非同寻常的连贯性，并与国内事务的重大关切保持着密切协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发布任何全面阐述本国战略目标和实施之道的官方文件。对于中国国内的政策分析家和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来说，中国大战略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幅增长，其增长幅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在自身地位获得提升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变得日益强势。2010 年中国对一系列事件（例如美国对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和日本在争议水域扣押中国船长）的强烈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理解中国的战略思维，并试图预测其战略思维将如何根据本国利益和领导人愿景而改变，尤显必要。



内忧外患

中国领导人在看待本国历史时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对外部威胁引发国内动乱一直相当敏感。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经常在内部叛乱和外部侵略的双重打击下被赶下台。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陷都城北京，同时满族人在明朝将领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导致明朝于 1644 年灭亡。大约三个世纪之后，满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内乱和西方及日本军队的外侵双重打击之下灭亡。中国国内革命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鼓舞与支援下，于 1949 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那时以来，对内部动乱的担忧仍然在中国萦绕。1949—1976 年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使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勾勒自己的战略目标。但很明显，决定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而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框限。那一时期的中国战略思维承袭了列宁主义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阵营，即主要敌人、次要敌人、潜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将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而内部威胁则相应地来自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亲美的“阶级敌人”。因此，坚持不懈地同颠覆中共领导或改变国家政治色彩的国内外阴谋进行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毛的对外政策据称代表“国际无产阶级”而非中国自身利益，加之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基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北京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大战略可言。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也就是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共将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新思维与毛泽东存在显著不同。中国与苏联或美国之间的大战不再被视为不可避免。中国努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这些国家的

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在中国看来，这种非对抗的姿态可以吸引国外投资并促进贸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稳步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都有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权力。

但是，尽管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国际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但传统的安全关切和防范西方政治渗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显的是，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对北京采取制裁，表明内外难题很容易相互交织，促使中国领导人警醒。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以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立场回应西方的责难，坚定地拒绝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还坚称，如果台湾试图搞独立，大陆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在21世纪伊始，中国的战略界人士仍认为国际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有利。200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可以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当然，中国的部分地区仍不时出现动荡，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对于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并予以强力应对。北京宣称，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这一“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证明了西方的“不轨图谋”。虽然中国政府间或被这类事件所烦扰，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仍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

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近年来中国已形成了一套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确保在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善治、改善社会安全体系、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自主创新、缓解社会紧张、完善金融体系、刺激国内消费。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中国对外出口大受影响，因此，推进上述经济和社会转型已变得更为紧迫。

考虑到这一现实，中国领导人已重新确立了对外政策目标。2009年7月，胡锦涛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